疫病四部曲

圖片來源：李男設計

李尚仁

從墨西哥突如其來地傳出「H1N1新型流感」流行的新聞，報導時該國已有一千多人罹病，近68人死亡，而且美國、加拿大、法國與英國都出現疑似病例。一時之間許多國際機場都開始架設量旅客體溫的儀器，墨西哥關閉圖書館、博物館、學校等公共場所，四處都可見到有人戴口罩，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啓動了應變機制。所有這些令人熟悉的場景，都讓人想起數年前震驚台灣社會的SARS大流行，甚至讓人懷疑歷史是否會重演。

嚴格說來，歷史是不會重演的，但類似的歷史事件卻常會出現某種模式。醫學史學者羅森堡（Charles E. Rosenberg）就認爲疫病引發的社會反應，往往出現相似的模式，其場景可分爲「逐漸揭露」、「處理不確定性」、「協調公眾反應」及「消退與回顧」四部曲。台灣SARS疫情的發展就相當吻合這四部曲的場景次序，而這波新流感的發展是否也會如此，更令人相當好奇。

逐漸揭露

羅森堡指出，疫病的開端通常是由不起眼的徵兆開始，人們往往不以爲意，甚至不願面對。接著跡象越來越多，並開始出現嚴重疫情，迫使社會面對危機。羅森堡引用卡謬（Albert Camus）的小說《瘟疫》（The Plague）的開場描述：主角柏納．希爾（Bernard Rieux）醫師在離開診所時無意間踩到隻死老鼠，他不以爲意地一腳把鼠屍踢開，渾然不覺這是瘟疫即將大流行的前兆。

2002年底台灣也出現類似場景，當時報紙的「大陸新聞版」、「兩岸三地版」開始零星報導中國廣東地區出現致死率頗高的「神祕肺炎」，並且傳言喝白醋可以預防「神祕肺炎」，導致恐慌的民眾把白醋搶購一空。然而，由於當時媒體充滿了「大陸搜奇」之類的報導，因此除非有親友是在廣東居住的台商或學生，恐怕大多數台灣民眾對這消息並不太在意。

值得注意的是，羅森堡宣稱：歷史上「大多數社區都遲於承認疫病的存在」，這是因爲疫病引發的社會反應及防疫的措施，大都會抑制商業及其他社會活動，而損害到許多既有的利益。「商人總是擔心疫病對生意的影響，政府當局憂心疫病對預算、公共秩序及行事慣例的衝擊。」因此各造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否認或隱瞞疫病的出現，直到「屍體堆積、病患人數增加以致官方再也無法忽視」。SARS 期間中國官方的隱瞞疫情，可說是這項歷史洞見最近的一個例證。

羅森堡認爲：「這種模式在每個世紀不斷重複，不管是現代初期的義大利、17 世紀的倫敦或是 19 世紀的美國，也不論那不受歡迎的訪客是鼠疫、黃熱病或霍亂，」社會對疫病的早期反應通常都是如此。同樣地，最近的追蹤報導指出，早在 2 月分墨國一個靠近大型養豬場的小鎮拉格羅莉亞（La Gloria），就已經出現疑似疫情，但墨國衛生單位卻沒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處理不確定性

疫病的發生帶來許多不確定的現象，新的疫病出現時尤其如此。在疫病發生時，人們常常問：爲何會發生這樣的疫病？爲何在此時此地發生？爲何是這些人受害而不是那些人？新的疫病出現的種種相關現象，似乎是隨機任意而沒有合理的緣由。這種混亂與不確定的狀態，往往導致心理和社會秩序很大的不安。對疫病的發生與傳播提出一套解釋架構，賦與令人恐懼的不尋常現象某種合理化的意義，成爲社會對疫病不可或缺的回應。

在西方直到 19 世紀中，這樣的意義架構主要是由宗教提供，疫病的發生往往歸咎於人們的道德疏失。到了 19 世紀霍亂流行時，雖然對疫病的宗教性理解仍然相當普遍，但已經和世俗的醫學研究有所區隔。神職人員也許仍認爲霍亂是上帝的旨意，但這無妨醫師運用上帝賜與人類的智慧和俗世的方法來研究疾病與醫治病人。

但即使在 21 世紀，對疫病的宗教性反應也沒有消失。例如台灣在 SARS 疫情期間，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團體都舉行祈禱會、法會等活動，而政府官員也不避諱參與。即使生物醫學提供了對 SARS 最主要的解釋架構，人們還是會對這場疫病提出某種道德解釋。例如「不該濫吃野生動物」、「尊重大自然才能避免病毒反撲」等說法，在生態學的語言中仍舊隱含了道德價值觀。

這波新型流感的流行，我們看到國家和國際防疫組織馬上根據現代醫學原則啓動相關機制，如案例通報與追蹤、機場篩檢來自疫區的旅客等。這些措施都企圖降低疫病的不確定性，但我們仍舊不確定它們是否會奏效。大概很少人希望這次流感會發展成重大的疫情，不過各國社會會以怎樣的意義架構來理解這波疫情？會責怪墨西哥落後與不衛生？反思全球化？還是尋求宗教慰藉？需要進一步觀察。

圖片來源：李易設計

協調公衆反應

疫病的流行常導致社會的強烈反應，一旦社會與有關當局由否認的態度轉爲承認，情勢往往也出現巨大的轉變，由忽視否認轉爲過度反應。處理與協調民眾的反應，經常成爲政府與衛生單位的一大難題，因爲反應過猶不及都會影響到疫情的控制，甚至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安、經濟損失及政治動盪。

SARS疫情在台灣引發的驚懼讓人記憶猶新，當時捷運中人人戴著口罩、公共場所門口有專人量體溫。疫情恐慌的高點甚至出現防疫「寧可錯殺一百」的強制隔離呼聲，部分知識菁英和政治人物則提出「台北封城」、「全國淨空」的提議，這些建議如今看來都太過誇張了。

台灣在疫情期間，對於來自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多倫多等其他疫區的旅客，一律採強制隔離10天的嚴格做法，對涉嫌違反規定的不只處以高額罰款，媒體還會群起圍剿。這些做法與現象後來被批評爲「過度反應」、「毀謗名譽」、「尋找代罪羔羊」及「侵害人身自由」，相關爭端甚至引發訴訟。這些防疫做法是否全都恰當，還有待探討。

這次流感是否也會引發類似的恐慌與過度反應？現在已經有人擔心經濟衰退時發生的這波疫情，會對倚重觀光業與農產品出口美國的墨國經濟造成重創。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已有部分民眾對墨西哥「非法」移民產生反彈的美國，是否會進一步排斥墨西哥裔？ 疫情出現後美國的豬肉消費已經開始下降。在經濟衰退的時代，各國是否會藉這事件進一步推動農產品的保護主義？

消退與回顧

疫病的消退往往不像它的爆發那麼具有戲劇性，但事後的紀念與檢討總是免不了的。更重要的問題是：社會記取教訓了嗎？或依然故我？從2002年底開始有中國南部出現「神祕肺炎」的傳言流出，到2003年6月15日最後一個病例在台北發病，SARS來得快但去得也快。它所留下的教訓，如醫院感染管控的重要、疾病通報系統的通暢、公共衛生體系的強化等，都彌足珍貴而有長遠價值。新型流感的出現，或許將考驗我們在SARS離去後是否確有檢討改進，是否眞能記取前車之鑑。 □

李尙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